

王云路 方一新 著

中古汉语
语词例释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古汉语词汇例释

姜亮夫题



王云路 方一新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

王云路 方一新 著

责任编辑：李静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17.5印张 6插页 395 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数：1—1 105 册 定价：11.00元

印刷：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ISBN 7-5383-1705-8 /H·36

序

蒋礼鸿

我的学生方一新、王云路写成了《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一书，要我在简端写上几句话。

以前说的“古汉语”，并没有人给分过期，而一新在他的一篇关于《世说新语》语汇的论文里提出了把“古汉语”分成上古和中古两期。这个设想很好，现在他俩这部书就是这个设想的具体实践。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语汇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小说、书简等方面。因为书简（如二王的“杂帖”）称心而谈，不借藻饰；佛经译语和小说则要适应一般市民的领受能力，需要采用通俗的语言：这都是很自然的。即使如此，有些高文典册如“正史”当中，也渗透一些通俗的成份，足资印证，所以作者也没有放松眼光而加以撷取。所谓“中古汉语”，其语汇来源大致是这样的。

我以为本书有两个特点和许多可取之处，试述说如下：

特点之一是研究、阐发的方面比较独特，关于中古汉语的著作，目前尚不多见。徐震堉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不是专书，只是零星地解释了《世说新语》里一些词的意义，没有蔚为大观。江蓝生同志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才是这方面的专著，而本书更加以推广，范围愈益扩展，与江书媲美而范围之广过之，这是很可喜的。

另一个特点是取材的浩博，从史传、佛经、地理书、书简、农书、笔记小说，到学术笔记，无不採录，以至列于“经部”的《左传》也所不遗。此外，对于古人的注解和时贤的说法，或择善而从，或加以补充修正，所花的功力是很多的。因此，本书能取得较多的成果，为中古汉语展示出较完整的面貌。

至于可取之处，则有如下述诸端：

一是对某些词条有很好的解释。如“浑”释为整个，全物不分割，因而说“囫圇吞枣”的“囫圇”当是“浑”音的缓读，可谓妙得神旨。

二是对前人、时贤的说法多所辨正。如“落英”条据蒋驥和近人游国恩、钱钟书等先生的说法批驳了“落英”是初开的花的说法。又如“贪狼”一条，《汉书·董仲舒传》有“以贪狼为俗”的话，颜师古注道：“狼性皆贪，故谓贪为贪狼也。”作者则以为颜说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古汉语的行文规律，如果指狼性贪，则应当作“狼贪”。相似的词语有许多，如《汉书·严助传》的“狼戾”、《食货志》的“狼顾”、《文帝纪》的“狐疑”，都是先名词后动词（或形容词），何以“贪狼”独独相反？实则“贪狼”犹言“贪婪”，狼、婪双声。又可作“贪恡”，见《魏书·酷吏·高遵传》。“贪狼”、“贪恡”与“贪婪”都义同音近。举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本书对前人、时贤释义的辨正之功。为了节省篇幅，其他的例子就不再征引了。

三是有些条目能够上溯它的远源（沿流就不管了）。如“善”条解为“易，容易。犹‘好（音hào）’”。除举证外，又说：“‘善’字作‘易’、‘好’解，早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已出现，如卷1《生气通天论》：‘陷脉为痿，留连肉腠，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又卷10《刺疟》：‘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大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善

‘呕’之‘善’与‘好大息’之‘好’义同。又卷11《刺腰痛》：‘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恐。’亦其例。”像这样的例子，能把词义出现的时间追溯到很久以前，对于说明词义的源流演变是有好处的。

四是有些条目中有很正确的校勘，能还古籍以真面目。如“贪狼”条说：唐·张鷟《朝野僉载》卷2：“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姪也，贪狼无厌。”此为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疑“贪狼”为“贪狼”之误。又如“解日”条释为“混日子，度日”，引《全晋文》卷23王羲之《杂帖》：“仆日弊而得此热，勿勿解白耳。”而说“解白”当是“解日”之误，这是很确当的。又如“从”条释“从”为堂兄弟，而徐震堉先生以为《世说新语·赏誉》的“人问王长史江彪兄弟群从”这句话的“从”字下脱去弟字。作者按云：“从”即从弟，不必补字。这是因为知道“从”是堂兄弟而能纠正脱字的说法，假如不知“从”的意义，就无法纠正徐先生的误校了。

五是指出了文籍中的一些僻义，可补一般词典、词书之缺。如“出”条指出这个词有翻译的意义是。又如“道”有品评义，“小行”有小便义，也是。

综观上面所说，这部书无疑是值得推荐的好书，故写下上面这些话，以告读者。

前 言

纵观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确如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朝代更换之频繁，汉族与汉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战争之持续不断，都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所罕见的。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四百年间，更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裂变时期，其朝代嬗替之快，地方割据之盛，强臣叛乱之多，外族入侵之频，又是其他朝代所难于比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的神学经学走向没落，魏晋玄学起而代之；道教开始形成并得到发展；佛教传入内地，早期依附于道教和玄学得到发展，并逐渐为中土统治阶层和民众所接受。由儒学独尊转变为儒释道三教并存。凡此种种，都对这一时期的语言、特别是语言诸要素中变化最快的词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之具有了若干鲜明的特点。约而言之，可有以下数端。

一、随着佛教的传入，汉译佛经的产生，汉语中出现了当时典范文言作品中难以见到的口语词和梵语音译词。

佛教创立于印度，大约在两汉之交时传入我国。随着佛教的传入，各种佛教经典也逐渐流传到中土，并由僧侣们翻译成汉文。正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语文常谈》第81页）佛经中有不少叙事完整、情节生动的故事，加上译经僧侣有意无

意地用当时的口语进行翻译，故东汉以来为数甚多的先唐译经中较大的口语成分，把它们比作汉魏六朝口语词材料的聚宝盆，是毫不夸张的。因此，汉译佛经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其他中土文献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而特殊的价值，亟待我们去发掘、利用。

除了口语词外，译经中还有许多梵语音译词，如偈、般若、菩提、阇梨、伽蓝、兰若、刹、优婆塞、优婆夷、佛、菩萨、和尚、尼姑、罗汉、阎罗、塔、魔鬼、地狱等，其中有不少词后来进入了民众日常用语中，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

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些佛经口语词的用法，已经影响了当时文人的语言。例如：西晋陆云在给同胞兄陆机的信中惯以“呼”作以为、认为讲，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札以“行”指屎尿，刘义庆《世说新语》以“併当”（屏当）指整理、收拾，“喜踊”指欣喜，“呜”指亲吻等，都可在佛经中找到源头。

二、随着东汉以来品评人物风气的兴起，两晋清谈风的盛行，产生了一批相关联的词语。

汉代举士选郎，一般要先经过州郡推荐，即所谓“乡举里选”。而名士的品评题鉴，则是荐举的重要依据。故自东汉末年以来，品评人物之风开始兴起。例如，郭泰、谢鲲号称有人伦之鉴，许劭、许靖有“月旦评”。魏晋以后，此风愈盛，“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十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前言》语）加之受正始玄学的影响，曹魏两晋清谈风盛行，产生了一大批与品评题鉴、清谈标榜相关的词语。诸如“道”由言说义引申为品评人物义，“云”由言说义引申为以为、认为义，“商略”由商量、商谈义引申为评鹭、评论义，“往复”、“往反”（往返）由进退、来回义引申为争论、辩难义等，都与此风尚有关。

除了产生新义外，也产生了不少相关的新词。仅以《世说新语·赏誉》一篇中以“清”字为修饰词构成的双音节词为例，据粗略统计，就有清峻、清格、清明、清通、清真、清伦、清微、清谈、清和、清纯、清朗、清识、清职、清才、清虚、清远、清峙、清婉、清中、清厉、清粹、清惠、清标、清言、清贵、清贫、清鉴、清举、清畅、清约、清称、清令、清疏、清辞、清辩等，达35个之多，全书更不待言。

三、朝代的更迭嬗替，政局的动荡不安，外族的频频入侵，造成了百姓的迁徙、移居以及各民族间的杂居、融合，因而出现了一批蛮夷之语和汉语方言词。

魏晋南北朝既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裂变时期，也是各民族大融合、大聚居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少数民族词语和汉语方言词，数量也很可观。仅以《世说新语》为例，就有“兰阁”（盖胡语）、“鲋隅”（蛮名鱼）、“淘”（吴语谓冷）、“解”（吴语谓锯木）、“两婆”（疑为“两三”之方言词）等。当时中原人与江南一带人互相轻视，中原人骂江南人为“溪狗”、“貉子”，江南人贬称中原人为“伧”、“伧父”，也都属于这类词语。书中还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名物、器具。如北方的“羊酪”，南方的“菹羹”，少数民族创制的“胡床”等等，也都和各地的生活习俗有直接关系。至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悬疑已久的“仆鉴”、“独力”二语，近代有学者认为源自于泰语（参张永言先生《训诂学简论》第39页）；也有学者认为“有可能以壮语释通”（见《文史》第23辑）。虽尚有不同看法，但它们是外来语则应无问题。

四、魏晋以来人们习惯翻用先秦词语，因而产生了许多新词和新义。

翻开六朝典籍，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许多在先

秦文献中使用的词组、仿语，到魏晋以后就被当作词来使用，以至约定俗成，为后世所沿用。最典型的是“友于”，此语见于《书·君陈》：“唯孝友于兄弟”，“孝友”连读，“于”是介词。魏晋人则割裂使用“友于”一语，后遂专以“友于”指兄弟之间的情谊，产生了一个新词。与“友于”相类似的又有“山陵”（出《战国策·秦策五》）、“乐推”（出《老子》第六十六章）、“式遏”（出《诗·大雅·民劳》）、“祝予”（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亲亲”（出《孟子·尽心上》）等可在《世说新语》中得见；“凡百”（出《诗·小雅·雨无正》）、“代耕”（出《孟子·万章》）、“驾言”（出《诗·邶风·泉水》）可在《陶渊明集》中得见；“启手”（出《论语·泰伯》）、“蹄涔”（出《淮南子·汜论》）则可在《晋书》中得见，等等。

六朝人翻用先秦词语还表现在把原来专属帝王的用词扩大用于人臣或百姓身上。例如：“谅暗”，本指帝王居丧；“登遐”（同“登假”），本指帝王之死，但晋人把这两个词都用在臣民身上。《晋诗》卷13孙绰《表哀诗序》：“作诗一首，敢冒谅暗之讥，以申罔极之痛。”又卷2孙楚《除妇服》：“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是其证。（参宋·王楙《野客丛书》卷28）又如“孤”、“寡人”，本亦皆为帝王之自称，《世说新语》中则均可用作人臣自称，分见《政事》第3、《文学》第19两条。“哭临”，本指帝后死丧，集众举哀的哀悼仪式，《三国志·魏志·孙礼传》：“礼为死事者设祀哭临，哀号发心”，其对象只是普通将士。

五、更多的，是由于书面语与口语的逐渐脱节，六朝文献中程度不同地保存了汉魏两晋以来产生并流行的方俗语词。

书面语与口语分离的痕迹，早在西汉的一些典籍中就已见其

端倪。象王褒的《僮约》、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和一些诏令、书信等，就表现出与当时传统的文言作品的明显差别，有不少口语成分。以《僮约》为例，在这份短短的几百字的契约中，就有“倩”、“捍大杖”、“上券”、“交关”、“侔偶”、“雨堕”、“吮尝”、“力索”、“乞乞”、“自搏”、“鼻涕”、“黄土陌”、“作恶”等俚俗化的词语，为同时代的正统作品所罕见，透露出西汉口语的一些消息。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面语与实际口语相脱节的现象就更趋严重。一方面，文字典雅、辞藻华丽的辞赋、骈体文充斥文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明快生动、俚俗随便的乐府诗、小说、书札以及医书、农书等，保存了大量的东汉、魏晋以来产生并流行的方俗语词。即便是向来被人们视为正统作品的六朝文人诗和史书，其口语词的蕴藏量也相当丰富，不容忽视。这些都是研究汉魏六朝词汇的最有价值的语言材料。

以上，我们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词汇的特点作了一个大致的揭示。概括说，第一点系指佛典而言，后四点则是指其他中土文献而言。可以看出，从汉代（主要是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阶段的汉语词汇极具特色，自成体系，它理应与先秦古汉语、唐宋后的白话文鼎足而立，三分天下，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和阶段。而传统的看法则把它笼统划入“古代汉语”的范畴之内，事实上成了上古汉语的附庸，受到冷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须利用纵向联系和横向比较的方法才能深入，才具有说服力，因而也更具科学性。以汉语史研究为例，一是要注意历史上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对汉语产生的深刻影响（如印度佛教的传入）；二是要注意中国文化的大系统内部汉语与其他子文化系统的交互影响（如民族战争导致

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混杂)；三是要注意汉语系统内部自身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的接续与变异(如先秦语言到六朝语言的演变轨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指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如果忽视了某一阶段的语言在外部影响和内在演变规律的双重制约下产生不同于前后阶段的巨大差异和质的变化,就会影响汉语史的研究与构建。就词汇史研究而言,则将会影响众多词语的断代、溯源以及对词义发展脉络的考察,而导致判断失误;以偏概全或前后脱节。这在一些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论著中是并不鲜见的。

说到汉语史的分期问题,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是王力、吕叔湘两位前辈的观点。王先生在《汉语史稿》上册《绪论》一章中,把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并概括出每一时期的特点。吕先生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体现在为《近代汉语指代词》和刘坚先生著《近代汉语读本》所作的两篇序中。吕先生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王先生的观点代表了五六十年代语言学界对汉语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史稿》在三十多年前就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尽管是粗线条的,但草路蓝缕,诚属不易。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

陆续提出补充修正意见，以期使汉语史的分期更加科学、合理。吕先生用“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开始出现”为标志，明确提出以晚唐五代为界，在汉语史中划分出“近代汉语”阶段，从而动摇了以往的“古代汉语”一统“五四”以前汉语史天下的传统看法，是极具卓识和远见的。在吕先生的倡导下，近代汉语成为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分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近代汉语”这一名称开始在语言学界通行。而这正是近年来国内研究汉语史分期问题的重大突破。

我们认为，关于汉语史的分期问题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讨论，这是因为：通常所说的“古代汉语”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绪论》语），而从汉代（主要是东汉）以来直至魏晋南北朝隋，书面语与口语的分化日见明显，除了大量的散文、韵文等传统的文言作品外，还确实实地出现了门类不同、数量可观而含有较多口语成分的作品，它们既有别于以先秦口语为主的“文言”，又有别于以唐宋口语为主的“白话”，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处于通语与方言并举，文言与口语相杂状态下的语言体系，是一个处在由文言词汇向白话词汇过渡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的语言体系。因此，有必要把“近代汉语”以前的“古代汉语”一分为二，析成“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两块，前者以先秦、秦汉的书面语言为代表，后者以自东汉到隋末约四、五百年间含有较多口语成分的典籍的语言为代表。也就是说，用“上古汉语”来指代传统所说的“古代汉语”，用“中古汉语”来指代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时期文献、特别是富含口语文献的语言。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初唐、中唐则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兹表释如下：

先秦、秦汉——上古汉语

西汉——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

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中古汉语

初唐、中唐——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

晚唐五代以后——近代汉语

当然，讨论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不能光从词汇的角度看，还应该综合考察语音、语法这两方面的演变情况和阶段特点。由于受到篇幅等因素的限制，我们未对此作展开论述。关于“中古汉语”这一说法，中外学者已有提及。我们只是想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郭在贻师生前曾经指出：“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读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先师的这一总体评价是很中肯的。现就识见所及，对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概况作一简单回顾。

如前所述，从汉代开始，言文分离的痕迹逐渐明显起来，在非正统的文献中，方俗语词时有所见。汉末服虔的《通俗文》，是最早解释这些词语的专书。此书虽已佚，但从清人辑本中仍可窥见其梗概。如说“言不通利谓之蹇吃”、“撞出曰打”、“理乱谓之撩理”、“除物曰摒挡”、“服饰鲜盛谓之嘈爩”、“难可谓之埤讹”、“小儿戏谓之狡狴”、“以箸取物曰鼓”、“去汁曰滗”等等，所释的都是较俚俗的口语词和方言词。服氏之后，较早措意晋、宋方俗口语的，有东晋孙盛、萧梁刘孝标和梁、陈之际的顾野王等人。孙氏著《晋阳秋》曰：“吴人以中州人为伧。”（《世说新语·雅量》注引）刘氏注《世说新语·排调》云：“吴人以冷为滗。”顾氏在《原本玉篇残卷·只部》“𪔐”下说：“《说文》：‘𪔐，声也。’野王案：今谓‘如此’为

“如𦍋”，是也。”“如𦍋”即“如馨”。均其例。

唐、宋时期学者，特别是众多的宋代学者，都曾留意于汉魏六朝语词，在各类笔记中加以考释或驳辩。唐代如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举释了北朝人婚嫁时布置“青庐”的习俗和作用；苏鹗《苏氏演义》卷上释“乾没”、“拉飒”，颜师古《匡谬正俗》卷5释“便面”、“闾氏”，卷6释“底”、“𦍋”，卷7释“量”，卷8释“上下”等，都考释了汉晋人语。而宋代学者最注意的莫过于“宁馨”、“阿堵”二词，刘昌诗《芦浦笔记》卷1、朱翌《猗觉寮杂记》、张洎《云谷杂记》卷4和补编卷2、马永卿《懒真子》卷3、洪迈《容斋随笔》卷4以及叶大庆《考古质疑》卷6等笔记均曾论及。（单释“宁馨”者，有高似孙《纬略》卷1；单释“阿堵”者，有黄朝英《靖康缙素杂志》卷4、庄绰《鸡肋编》卷下、许观《东斋记事》等）其他如王观国《学林》卷4“方俗声语”条释“夥颐”、“爹”、“依”；赵叔向《肯綮录》释“客作”；孔平仲《珣璜新论》卷4释“官家”、“劣”；袁文《鬳斋闲评》卷3释“卿”；程大昌《演繁露》卷6释“润”，卷10释“白接鬲”；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事始》释“欢”、“爹”，卷2释“拼当”、“一顿”，卷5《辨误》释“𦍋𦍋子”；高似孙《纬略》卷3释“凤毛”、“麈尾”，卷6释“𦍋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释“儿”、“可儿”；王楙《野客丛书》卷13释“阿”、“丈人”，卷23释“咄嗟”；杨伯岩《臆乘》释“郎”、“奴”、“索妻”；赵与时《宾退录》卷3释“分疏”，卷9释“索妻”、“不快”；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3释“绝倒”、“拼当”等，都诠释了六朝人语。其中多数词语释义妥切，若干条目还比较精采，但也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尚属幼稚的错误。如吴曾《辨误录》卷中“宁馨儿”条以“宁馨儿”为“不佳”；杨伯岩《臆乘》以“可儿”为王

敦“小字”，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卷8“阿奴”条沿袭《世说新语》刘注之误，以“阿奴”为周谟小字，因议改《晋书·周顗传》“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之“阿奴”为“阿嵩”，王楙《野客丛书》卷3“晋史舛误”条说同，均误。

宋人笔记中还有一类内容，即：为俗语寻源。如《珩璜新论》卷4为“仰”、“平善”、“瓜葛”、“阿谁”、“停待”等词找出处；又《鸡肋编》卷上“管中窥豹出处”条、《野客丛书》卷29“俗语有所自”和卷30“健儿跋扈”条、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9《评文》“俗语皆有所本”条等条目，亦为部分六朝语词寻找出处。这为后世俗语、俗谚等专书（如《通俗编》、《恒言录》）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金朝的王若虚也注意到了晋、宋语词，并能从语法上加以阐明。如《滹南遗老集》卷33《谬误杂辨》引释“宁馨”曰：“宁犹‘如此’，馨，语助也。”

元代对六朝语词研究有贡献者，应当首推元初学者胡三省。他的《资治通鉴注》虽为《通鉴》而作，但在注魏晋南北朝一段历史时，每每指明当时俗语，类皆精核。象《晋纪二·武帝泰始十年》注：“自列，犹自陈也。”《晋纪四·惠帝元康七年》注引程大昌说：“将无者，犹言殆是此人也。”《晋纪十五·成帝咸和元年》注：“中朝，谓西晋。”《晋纪三四·安帝隆安五年》注：“江东人士，其名位通显于时者，率谓之佳胜、名胜。”《齐纪七·明帝建武四年》注：“晋宋间人，多谓从弟为阿戎，至唐犹然。”皆是。元人笔记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如李冶《敬斋古今注》卷4释“料理”、“倒栽”，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释“客作”、卷9释“不快”等。

明人谈经史训诂之学的笔记，大都芜杂空疏，偶尔亦有涉及晋、宋以来语词者。如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3“晋多用信字”

条，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5“阿堵”、“宁馨”、“明驼”条，杨慎《艺林伐山》卷6“茗柯”条等。又杨慎《谭苑醍醐》卷6“《世说》误字”条辨《赏誉》“逸少清贵人”之“清贵”为“清真”之误，以李白诗“右军本清真”为证，并释“清真”为“谓清致而真率也”，较有见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方以智的《通雅》。此书一破传统雅书对汉魏以来俗语不甚措意的弊病，用较多篇幅考释了中古语词。如卷4《释詁·古隽》释“凿空”、“相於”、“逗留”、“通悦”、“嗔嘘”，卷5释“冰衿”、“登”、“摸索”、“郑重”，卷6《谜语》释“拉沓”、“笼东”、“屏当”、“料简”、“落魄”，卷49《谚原》释“宁馨”、“阿堵”、“乃淘”、“将牢”、“透水”，等等。除个别条（如“乃淘”、“透水”）的释义不当外，大抵言而有征，考辨精审。

清代学者把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重点放在上古汉语一段，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不够重视，但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也时有论及。例如：黄生《义府》卷下“新妇”、“踢跶”、“将无同”、“茗柯”、“揜挝”、“《冥通记》”等条；顾炎武《日知录》卷24“郎”、卷32“信”等条；胡鸣玉《订讹杂录》卷3“宁馨”、“阿堵”、卷5“茗芽”、卷6“狡狴”、卷9“客作”等条；李调元《卮斋琐录》卷1释“僎”、卷4释“阿堵”、卷5释“将牢”；李调元《剿说》卷1释“脱”、卷3释“已”；祁骏佳《遁翁随笔》卷上释“宁馨”、“阿堵”；王应奎《柳南随笔》卷5释“身”；卢文弨《钟山札记》卷3释“觉”、“卿”；赵翼《陔余丛考》卷22释“猖獗”、“绝倒”，卷36释“卿”、“小郎”，卷43释“相打”、“生活”、“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灑”、“咄”、“𩚑”等字注；俞正燮《癸巳类稿》卷7“乃淘还音义”条释“宁馨”、“尔馨”、“如馨”等；梁